

僧古·萨里《金光明经》翻译方法谈

买提热依木·沙依提

(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 北京 100081)

【摘要】 翻译这一古老的双语活动对人类历史文化有着深远的影响。本文梳理了僧古·萨里《金光明经》回鹘文译本中的几种翻译方法和翻译技巧, 并对语言翻译的古今特点进行了简要对比, 以期对古代突厥语族语言翻译学研究以及当代双语活动研究有所帮助。

【关键词】 僧古·萨里; 回鹘文; 《金光明经》; 翻译技巧

【中图分类号】 H215.5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4-280X (2011) 03-0007-05

一、突厥语族语言翻译学形成时期的推测

我们回忆古代突厥语族语言记录下来的文明史, 尤其是当我们读到鄂尔浑河流域的古代突厥碑铭文献、回鹘文《金光明经》、《弥勒会见记》、《玄奘传》, 喀喇汗王朝时期的《突厥语词典》和《福乐智慧》时, 就会发现, 我们的祖先很早就使用“双语”, 而且非常成功。纵观历史, 突厥语族文学语言的翻译或双语使用, 最辉煌的时期大约在回鹘文佛教文献时期。回鹘文佛经主要是由三种语言翻译而成的: 一部分是译自古代库车语、焉耆语, 如《弥勒会见记》; 一部分是译自汉文, 如《金光明经》和《玄奘卷》; 后期的一些佛经则是从藏文翻译过来的。

大部分回鹘文文献出现在大约 9-10 世纪, 所以, 有些学者把这一时期称为佛经文献的黄金时代。回鹘文使用末期, 在吐鲁番地区大约是在 13-14 世纪, 而敦煌一带可能是 17-18 世纪。13 世纪, 由于当时吐鲁番地区回鹘王国国王巴尔术 (Barčuq) 自愿归属成吉思汗, 所以王国内部的传统生活方式和宗教信仰逐渐发生变化, 回鹘文的适用范围和频率也逐渐缩小和降低。因此, 虽然在吐鲁番地区还能发现属于 14 世纪的佛教文献, 但很难发现属于 16 世纪以后的佛教文献。在敦煌一带发现得最晚的用回鹘文写成的佛经 (写本) 是属于 17 世纪 (清康熙二十六年, 1687 年) 在甘肃刻成的《金光明经》(kang-si yigirmi altınç yil altınç aynıng säkiz yangısı...başlayu bitip, säkizinc aynıng biş yigirisintä bitiyü tolu qıldım “康熙二十六年六月初八开始写, 8 月 15 日写完”)。

维吾尔族或突厥人的祖先究竟什么时期开始从事翻译和使用双语, 现在还没有一致的观点。但是北京的一些学者研究得出的结论是, 匈奴 (包括突厥) 语言与汉语之间互译并借用词语的历史可追溯到公元前。他们认为古代“匈奴”、“突厥”、“回鹘”都是民族语称谓, 汉文里借用汉字来拼写当时民族语言词汇的读音。比如, 匈奴语言中本族族名发音用汉字记录为“匈奴”, 突厥人对自己的称呼发音用汉字记录为“突厥”等。在《维吾尔族历史》中谈到: “公元前 11 世纪左右, 我国北方有一个叫做匈奴的游牧部族。他们有时也自称为胡。”^[1] 据此可知, “匈奴”和“胡”的名称公元前

11 世纪已经出现并已进入汉文史籍。众所周知,“匈奴”和“胡”自古以来就泛指匈奴、突厥、回鹘等北方民族。尤其是“胡”,很多情况下就是指“回鹘”。因此我们可推测,匈奴人以及突厥人或回鹘人可能公元前 10 世纪就跟说汉语的民族或部落接触,通过相互学习语言来交流。跟其他语言的接触,如古印度语、古波斯语等,最早的时间都可追溯到公元前。这些现象至少说明,学习他人语言是人类社会生存和发展的必然需求。

二、僧古·萨里在《金光明经》中常用的翻译技巧

回鹘文《金光明经》的跋文中写到: Kinki boşğutluğ bişbalıqlıǵ sīngqu sāli tawğaç tilintin türk-uyğur tilinçä ikiläyü äwirmiş (“后学的别失八里人僧古·萨里又从汉语译为突厥——回鹘语”)。因此,毫无疑问,《金光明经》的翻译者是僧古·萨里。

回鹘文《金光明经》的语言特点表明,该文献成书于公元 9 到公元 10 世纪左右,所以文献译成的年代应该也是公元 9 世纪末。于此,我们可推测,僧古·萨里(sīngqu sāli)的出生年代是公元 9 世纪,而肯定不是公元 10 世纪。

在《金光明经》回鹘文译本中,僧古·萨里最常用的翻译方法有 7 种:

(1) 直译

“直译”,有些著作里称为“逐词翻译”。汉语佛教术语“三宝”直译为 üç ärdäni。这样的例证比较多,如 altı qaçığ “六贼”、bäş yol “五道”、bäş çöbdik “五濁”、tört toğum “四生”、on urun “十地”、üç ağu “三毒”、üç ät’öz “三身”等。在佛经内容中,一般是先出现某一个佛教术语,然后加以注释,对此,僧古·萨里(sīngqu sāli)“直译”佛教术语,对具体注释部分则用意译法翻译。直译时形式放在第一位,而内容即意义放在第二位。现代维吾尔语翻译我国国家法律法规,以及中央领导讲话时,对新词术语有时也采用“直译”法翻译。

(2) 意译

“意译”有些著作里称为“注释性翻译”或“逻辑性翻译”。“大乘佛教”一词来源于古印度佛教文化,古印度语为 mahāyanā,古代维吾尔语译成 ulugh külungü,意思就是“大乘佛教”派别,同样,“小乘佛教”一词也来源于古印度佛教文化,古印度语为 hinayāna,古代维吾尔语译成 kiçik külungü,意思就是“小乘佛教”派别。僧古·萨里(sīngqu sāli)翻译佛经术语或其他词语时常用“意译”法。“意译”时形式放在第二位,内容即意义放在第一位。在佛教故事情节中术语的定义性内容都是用“意译”方法来翻译的。现在汉语和其他语言的文学作品翻译成维吾尔语时,都很重视“意义翻译”。

(3) 音译

“音译”,即外来语的发音和词汇意义直接借用(有一部分发生了语音变化)。如 ananta(<ānanda)“阿难陀”,buddaya(<buddhāya)“佛”,buşi(<布施)“布施”,tayçing(<大清)“大清”,toyin(<道人)“僧人”,tung xuang ~ tung kuuang(<敦煌)“敦煌”,sansar(<samsāra)“轮回”,şamanç ~ şamananç ~ şimnanç(< Sanskrit)“女僧人”,şing(<升)“升”,namo(< Sanskrit)“尊敬”,nayut(< Sanskrit)“无数”,samatso(<三藏)“三藏”等。

根据现代翻译学理论和本人的翻译经验来说,使用“音译”有四种情况:一是翻译者认为有些术语或词语是表示“神圣”的概念。如《古兰经》一书的名称在很多语言里都以音译的形式出现。二是翻译者不能完全理解源语言中一些奥妙的术语或词汇含义时,一般直接用源语言的词汇。三是翻

译者即使理解,但当时找不到合适的词汇,又不会创造新的词语时,可能直接借用源语言的词汇。四是翻译者认为读者具有相当高的双语语言基础,所以用不着翻译所有的术语或词语。在这几种情况下译者就直接借用源语言的术语或词汇。我认为,在《金光明经》翻译中这四种情况都有。

(4) 半音译半意译

“半音译半意译”的方法主要体现在组成合成词的一部分是突厥语词汇,还有一部分是外来语成分。如: bāṣ (五, 维吾尔语) çaxṣapit (<Sanskrit) “五戒”, tōrt (四, 维吾尔语) maharaṇç (<Sanskrit) “四大天王”, xua (<花, 汉语) çāçāk (uyghurçā) “花”, sākiṣtüzünbaçağ (uyghurçā) çaxṣapt (<Sanskrit) “八关斋戒”, soo (<锁, 汉语) altun (金子, 维吾尔语) “金铤”, qaliliğ (uyghurçā) nirwan (<Sanskrit) “有馥涅槃”。

使用“半音半意译”主要有两种情况:一是翻译者不能完全理解源语言中一些深奥的术语或词汇含义时,一般直接用源语言的词汇。二是翻译者虽然理解词义,但找不到合适的词语完全意译时,可能部分地借用源语言的词汇。这种翻译法在《金光明经》有不少例证,值得进一步研究。

(5) 用借词和母语词语重复翻译

“大乘佛教”一词来源于古印度佛教文化和古印度语言 mahāyanā, 古代维吾尔语译成 ulughkūlungū, 但有时这两种名称会在前后文中同时出现。类似的情况还有: darmaçakiri (<dharmaçakra) nomluqtılğān “法轮”, nayut (<Sanskrit) sansiṣsaçiqṣiṣ “无数”。这是僧古·萨里翻译这部佛经时使用的一种方法,也是这部译著的特点之一。应该说,这种翻译方法属于“训诂学”范畴。维吾尔语训诂 (taepsirlaesh) 主要是受两种语言训诂学的影响而形成的:一是汉语训诂学,二是阿拉伯语训诂学。汉语训诂学公元前就形成,主要用于解释古时著作中的人名、地名、主要事件以及解释古字、方言词汇。阿拉伯语的训诂学是随着伊斯兰教的进入,为解释《古兰经》而出现的。

(6) 增加词语翻译

根据上下文的需要,在翻译文本中增加一些词语甚至一些句子。这种手段可看作翻译的一种技巧。《金光明经》译本中出现了大量原文本没有的词语。这种手段在翻译诗歌时更为多用。僧古·萨里把原汉文4行诗歌翻译成古代维吾尔文时变成了8行诗,这说明翻译过程中增加了一些词语。如:

汉 文	僧古·萨里译文
祸哉爱子端严相	nādaārtiatayīm
	körkläkiyāögüküm
因何死苦先来逼	ölmäkämğaknāçükin
	öngräkälipärtürdi
如我得在汝前亡	sāntidāöngräölmäkig
	bulayınaykūnkiyām
岂见如斯大苦事	körmäyinärtimunitäg
	uluğaçığāmğäkig

以上的汉文中并没有 ögüküm “我的妈”、ärtürdi “带走了”、kūnkiyām “我的小太阳”等词语。僧古·萨里在译文中增加这些词语,一是为使形式更符合古代突厥挽歌体诗歌传统;二是将这些词语融合到译文中,能更加细致深刻地表达出原文中的悲哀之情。

再如,“我不信诸佛,亦不敬尊亲”译成 kirtkūnmādimārsāralquburxanlarığaymadimārsār。

原汉文句子中实际表达的含义是“我没有……的话”，因此，僧古·萨里根据汉文前后的内容译成...mädimärsär“假如我没有做到”。《金光明经》回鹘文译本中这样的句子非常多。

(7) 减缩词语翻译

回鹘文译本《金光明经》从96页开始一直到130页全是诗歌，这部分的翻译难度非常大。同样，我们也感觉到有些内容回鹘文译文与汉文文本之间有差异。其中有些差异部分是翻译时减缩原文的结果。这些减缩部分的对比研究难度很大，尚需要深入研究。

以上几种翻译方法和技巧中，如今在汉语与维吾尔语翻译的书面语当中也经常借鉴使用。其中，以半音译半意译方式译介而来的词语在维吾尔语口语当中，尤其是乌鲁木齐口语中最为常见，可惜还没有得到系统研究。用借词和母语词语重复翻译，则是学者学习古代汉语、英语，或宗教人士在清真寺讲解《古兰经》或《圣训》时经常用到的方法。

三、古今翻译和双语活动比较

现在，很多人都懂多种语言，有的甚至会十多种，而且用得非常熟练。有些学者跟周围说土耳其语、英语、德语、法语、阿拉伯语以及维吾尔语的人能够很自然地用对方母语进行交流。这说明大家已经成为“双语者”或“多语使用者”。很清楚，“双语”这样的术语出现还不到一个世纪。过去懂很多语言的人常被当作或称为“翻译”。这样说来，僧古·萨里是一位古代翻译家。古代“翻译家”与现代“双语者”作为术语概念、含义、内涵方面有哪些异同，是另一个研究话题，本文不涉及。本文只是简单地总结了中古时期翻译大师僧古·萨里的翻译艺术，同时把他的翻译艺术与现代维吾尔语翻译作了一些简要的比较，归纳出汉语与维吾尔翻译中历史上成功的一些实用技巧。

我们把古代的翻译——书面双语接触与现代的双语活动加以比较或对比时会发现，二者有很多共同之处，同时也有不同之处。

其共同之处有：

1. 古代的“翻译”和现在的“双语”活动，都体现了语言的本质。语言是交流的工具。一种语言是一个社会内部交流的工具，而翻译或双语活动则使得这种语言超越其原本的使用范围。所以，“翻译”和“双语”活动扩大了语言交流的界限，体现了语言的本质。

2. “翻译”和“双语”活动都促进了书面语的完善和发展。

3. 对“翻译”和“双语”活动的科学研究有利于语言的保护和发展。

4. 从理论和方法论要求来说，“翻译”和“双语”活动都首先要求理解翻译源语言是基础，准确表达是目的，保持语言特征是风格。就是说正确、完整、保持风格是“翻译”和“双语”的最基本要求。

5. 上述僧古·萨里的翻译方法中“直译”、“意译”和“音意译”、“半音半意译”和“借词与母语词汇重复翻译”是二者最为常用的翻译方法。

不同之处有：

1. 翻译速度发生了变化。现代社会中，翻译工具、翻译方法不断更新，翻译文本的速度大大加快，有时翻译速度能基本与人的思维同步。古代语言翻译、交流的速度是无法与现代人相比较的。

2. 古代学习和掌握多种语言的人数规模不同。学习其他语言和使用语言进行书面翻译的人群基本属于上层社会人士。现在学习和使用多种语言已经或正在普及到整个社会。

3. 学习他人语言和从事翻译的目的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根据我们所看到的资料，相当一部分

古人学习其他语言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为宗教服务。也就是说，古人常常通过学习其他语言来适应宗教信仰的追求。而现在，人们使用翻译和双语工具的目的无疑是多种多样的。

4. 现代社会翻译和双语研究的手段更科学。通过“翻译”或“双语”活动，现代社会给人们带来更多发展机会，但对一些较小民族的语言和传统文化的冲击也愈来愈引起人们的担忧。

参考文献：

[1] 刘志宵. 维吾尔族历史[M]. 北京：民族出版社，1985.

作者简介：

买提热依木·沙依提，男，维吾尔族，中央民族大学维吾尔语言文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维吾尔语言文化及双语教学。

（责任编辑：李玲）

加强双语教师培训 促进民族教育发展

——第七次全国双语教师培训班在京举办

2011 年 8 月 6 日至 14 日，在国家民委、教育部等部门的大力支持下，由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和中央民族大学少数民族双语教育研究所共同举办的第七次全国双语教师培训班在京开班。60 余位来自新疆、宁夏、内蒙古、吉林、黑龙江、云南、江苏等 7 省区的汉、维、哈、塔塔尔、回、朝、景颇等 8 个民族的双语教育一线教师和教育研究工作者参加了此次培训。

这次培训班的目的在于贯彻落实 2010 年召开的全国教育工作会议精神，“提高理论，研究方法，了解信息，学术交流”。在为期 9 天的培训中，培训班采取专题报告和分组讨论两种形式进行交流。北京大学、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负责双语教材编写出版的同志也来到培训班现场，倾听一线教师对少数民族双语教材编写的意见和建议，以便更好地修改和编写适应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实际的双语教材。

中国少数民族双语教学研究会作为国家民委主管的国家级学术团体，一直积极致力于我国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教育事业的发展。通过举办全国双语教师培训班，对进一步贯彻落实全国教育会议精神，推动双语教育理论研究和双语教学法的探索，提高双语教师的理论水平和业务水平，必将对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的双语教育起到积极的作用。